

中国外交大转型及其中国特色¹

李志永

内容提要：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该国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该国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中国外交大转型的特定任务是由中国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政府与国内外社会的良性互动能否实现，这可能是中国外交大转型面临的更大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外交转型；中国外交；中国特色；“一带一路”；总体外交

作者介绍：李志永，男，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外交与中马关系。邮箱：lizhiyong@uibe.edu.cn

Title: China'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When,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existing foreign policies can no longer protect national interests, then revision of these policies is necessary.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has historical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roots. Such

1 本文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惠园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微观落实’：公私合作制的视角”（项目编号2017JQ05）项目的资助。

out of norm realignments of policies were shaped by China peculi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se adjustments were made in areas such as diplomatic guiding principles, diplomatic goals, services,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 Faced with new global security risk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llenges, China's foreign policies need changes. Beijing is eager to change but its success is dependent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way well be the greater challenge facing as well as potential opportunity that can come about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all Diplomacy

Author: Li Zhiy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Malaysia Relationship. Email: lizhiyong@uibe.edu.cn

建国六十多年来，伴随世界局势和中国内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也在不断变化与转型，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于 2010 年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国际格局也加速了重组进程。伴随西方的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国家却在危机中不断崛起，并试图重塑世界。21 世纪尤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正在经历新的重大调整与转型。中国外交转型在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外交转型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从理论上厘清中国外交转型的特定内涵与基本任务及其中国特色。为此，本文试图在总结学界对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现状，结合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现实国情探讨当前中国外交转型的根源、任务及其中国特色，以推动中国外交的研究，并为当前中国外交转型提供某种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中国外交转型：基本内涵与研究现状

（一）外交转型²的基本内涵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对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追求，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一般理论建构或比较外交政策分析，而很少关注国际政治以及外交政策变迁。冷战结束前后各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迁及其引起的重大后果使得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变迁开始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为了理解国际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我们必须同时去理解世界的总体变迁与外交政策的具体变迁。”³ 鉴于变化是任何事物的必然现象，霍尔斯蒂曾尝试对正常的外交政策变化和外交政策重构（restructure）做出区分。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常规性变化属于那些缓慢、累积性的政策性变化，各变化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外交政策重构通常包括一国对外关系的整体型态在不同领域的共时性嬗变。⁴ 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学者赫尔曼（Charles Hermann）认为，外交政策变迁依据调整幅度的大小，具有四个层次，即调适性变迁、程序性变迁、问题或目标性变迁和国际定位变迁。其中国际定位变迁表现为行为体对世界事务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的全方位的转向调整，⁵ 属于

2 严格说来，外交转型与外交政策转型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更多地与外交形态相关，如从偏重“高政治”的传统外交到重视“低政治”的当代外交，从漠视非政府组织的外交到日益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外交的转变。而后者更多地与一国具体对外政策相关，如一国对待国际体系、国际重大事务的立场变化，对外交目标、外交手段的调整。就此而言，外交转型内容更为一般与抽象，而外交政策转型的内容更为个别与具体。但在国别外交实践中，一般外交形态的转型与具体外交政策的转型往往是相互掺杂的，而不是泾渭分明的。故本文对此并不严格区分，本文的外交转型指的就是外交政策转型。

3 Jerel Rosati, Martin W. Sampson and Joe D. Hagan. *The Study of Change of Foreign Policy*. in Jerel Rosati, Joe D. Hagan and Martin W. Sampson eds.,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p. 4.

4 Karl Holsti. *Restructuring Foreign Policy: A Neglected Phenomenon in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Karl Holsti ed., *Why Nations Realig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p. 2.

5 Charles F.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1, 1990, pp.5-6.

外交政策重构范畴。罗萨蒂 (Jerel Rosati) 将外交政策变化依次总结为变化日益加大的“三 R”：即微调、改革与重构，其中重构类似于霍尔斯特对外交政策重构的界定。⁶

本文认为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该国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该国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政策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可见，国内外形势是否发生转折性变化是判断一国外交是否需要进行外交转型的关键。所谓转折性变化是指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与既定形势不同趋向的转变或者在既定趋向上发生了剧变。因此外交政策的微调不能构成外交转型，只有那些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的外交政策才属于外交转型或重构。这种外交转型主要包括外交思想、外交目标、外交对象、外交手段、外交形态、外交机制等属于外交政策基本元素的转折性调整。

(二) 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的大起大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不断调整，使得中国外交转型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并产生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综观这些研究成果，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演进与现实任务是两个主要研究主题，历史与现实视角是两个研究切入点。

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的历史视角侧重于观察、总结新中国（或者更早）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经历的战略调整或立场变化。国内外学者均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角度来论述中国外交转型，并基本上遵循“十年一大变”的划分方法。⁷与关注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节点不

6 Jerel Rosati. Cycles i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the Polit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Jerel Rosati, Joe D. Hagan and Martin W. Sampson eds.,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pp.221-261.

7 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分期，参见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omas W.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1940s to 1990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41-51页；周溢演：〈关于新中国外交史分期问题的浅见〉，《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第

同，部分秉持历史视角的学者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历史关系来观察中国外交转型，认为中国对待国际社会态度经历了从排斥拒绝到参与融入的转变。⁸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内部发展和中国崛起引起的世界关注，中国外交出现的一系列新理念新实践备受关注。国内外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开始从历史的视角转向现实的审视。与关注中国外交经历了何种转型历史路径不同，中国外交转型的现实视角更加关注崛起的中国外交将向何种方向转型，需要完成哪些转型任务，具有哪些中国特色，是否要坚持奋发有为等现实问题。⁹

50-53页；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章百家：〈目标与选择——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9-95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杨公素著，张植荣修订：《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1949-2001）》，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张植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地缘政治与睦邻外交研究》（修订版），香港：励志出版社，2008；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8 相关研究参见，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玛格丽特·皮尔逊：〈主要多边经济组织与中国接触〉，（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伊丽莎白·埃克诺米，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闫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时殷弘：〈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
- 9 相关研究请参见，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2003, 82(6): 22-35. Joseph S. Nye, Jr.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December 29, 2005. Minxin Pei. Assertive Pragmatism: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EUR-IFRI Proliferation Papers*, Fall 2006. www.ifri.org/downloads/Prolif_Paper_Minxin_Pei.pdf. 取用日期：2017年11月12日。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World Needs a Assertive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2/21/opinion/21iht-edchristensen21.html?pagewanted=all>. 取用日期：2017年11月12日。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2008, 87(4): 2-26. 王逸舟：〈论中国外交转型〉，《学习与探索》，

可见，中国外交巨变的历史轨迹和不断调整的现实诉求刺激了一大批中国外交转型研究成果的产生。历史与现实视角各有侧重，历史视角主要被外交史学者采纳，关注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节点与立场转换，现实视角主要被国际关系学者应用，关注中国外交转型的未来方向与基本内容，但中国外交转型并不单纯是一门历史学问也绝不是一门预测学问，而是由历史遗产与现实环境共同决定的综合学问。因此，中国外交转型研究需要将历史与现实视角加以整合，既使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研究具有现实价值，又使中国外交转型的现实研究具有历史理据。只有综合了历史与现实视角的研究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才能为中国外交现实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南。但当前国内外中国外交转型研究通常只偏重一种视角，而忽视了另一视角的价值。本文认为，中国新一轮外交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特殊的现实基础，因而对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只有深入关注到其特殊的历史、现实根源及特色，才能理解中国外交转型的必然及其发展趋势。

二、中国外交大转型的根源与内涵

（一）中国外交大转型的历史根源与内涵

一个自视“天朝”的“上国”，一个有着众多番邦和属国的泱泱大国，在与“坚船利炮”的西方相遇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席卷而来的西方现代化的浪潮。¹⁰这应该是研究包括中国外交转型在内的当今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鸦片战争后的特

2008年第5期，第57-67页；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6-18页；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2-51页；赵可金：〈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4-14页；吴心伯：〈大国外交：挑战与应对〉，《东方早报》，2013年3月18日，第A15版；尹继武：〈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第34-43页；高小升：〈新时期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与影响〉，《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4-52页。李志永：〈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视角〉，《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第70-90页。

10 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殊时空情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在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任务和维持现实的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¹¹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外交始终在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推动社会变革与恢复大国地位这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¹² 从中国外交的历史分期看，不同的历史分期本质上折射的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与四重目标在平衡与失衡之间“不断剧变”的波动规律。从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及其达致主要目标的主要手段来看，新中国外交可划分为安全外交、发展外交和复兴外交三个阶段。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始于1949年终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此阶段为安全外交阶段。所谓安全或政治外交阶段，即中国外交的目标和手段主要集中于安全与政治方面，而经济或其它目标则明显从属于安全与政治需要。中国外交的第二阶段，始于中美建交的1979年终于奥运会与建国60周年的庆典，此阶段为发展或经济外交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外交开始进入复兴外交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较于前六十年的安全外交与发展外交，复兴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外交的社会化与外交的大国化。外交的社会化不仅意味着中国将通过社会改革促使公民社会在中国外交中发挥日益重要和突出的作用，还意味着中国将日益重视对他国公民社会的外交工作，这是中国外交实现创造性塑造的社会基础和创新源泉。外交的大国化意味着中国外交主要目标将致力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承担大国外交责任，这是中国外交的长远理想。

中国外交之安全外交解决了中国的独立与生存问题，但革命造反的立场和对政治自主性的过度追求终究导致了中国外交的失衡；继之而来的发展外交基本解决了现代化与融入既存国际体系的问题，但对自主性与大国地位的珍视必然导致对纯经济外交和实用主义的反思，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双重崛起必然导致外交的社会化与大国化不可阻挡。社会外交与大国外交的兴起必将丰富中国外交的画

11 李志永：〈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70-71页。

12 章百家：〈目标与选择——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9-95页；

面，并使中国外交逐渐摆脱这种“不断剧变”的历史波动律，实现中国外交的常态化回归。具体而言，此次转型是在主权得到基本巩固、现代化目标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试图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推动社会变革与恢复大国地位的“四重唱”；是在总结政治、经济外交经验教训基础上，试图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均衡统一；是在融入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如何在体制内以大国外交的方式做出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贡献并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保护。这是当前中国外交转型的特定历史内涵，是实现外交社会化与外交大国化的转型。因此，此次中国外交转型既不是外交盟友的变换、某个外交新理念或者特殊的外交风格，也不是一个外交目标对另一个外交目标的简单替代，与历次外交转型相比，此次外交转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固可称之为“大转型”。

（二）中国外交大转型的现实根源与内涵

霍尔斯蒂认为，当国家目标的改变或内部与外部所发生的转变致使当前的政策模式无法在重大利益的维护上产生效益时，就有重构的必要。[4](P.2) 如果说特殊的历史境遇与目标选择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迟早经历重大转型方能凤凰涅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则决定了中国外交大转型必须加紧推进以抓住战略时机。据此，本文认为，外交转型的条件有四个且满足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要求该国外交政策进行重构：其一，国际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这包括国际权力、国际制度与国际观念这三大结构纬度出现较大变化；其二，国家实力出现重大变化，即相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其它国家而言，该国权势地位出现较大跃升或下降；其三，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定位出现重大变化，即国家相对于国际体系造反者、游离者、融入者、建设者或主导者相对定位的变化；其四，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化，即内政的变化要求外交的变化。

当前中国外交具备了这些转型条件了吗？其一，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结构正在经历剧变，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扎卡里亚曾将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称之为“第三次权力转移”或者“他者的崛起”。在此影响下，

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国际体系呼之欲出。¹³虽然关于“后美国时代”是中美两国集团主导（G2）还是多极化不可逆转抑或是“无极化”（G0）时代的到来尚无定论，但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全球权力转移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围绕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民主、自由等人来价值观均展开了新一轮竞争。其二，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坐二望一”，国际影响迅速提升。其三，中国不仅是当前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还是主要的既得利益者与捍卫者，并正在积极争取成为未来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其四，中国内政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在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当下中国正面临艰巨却不得不逐步展开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改革攻坚的任务，这些重大改革的展开必然会对中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重塑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与性质。

综上所述，中国外交的内外形势，决定了中国外交大转型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由于中国外交这一重大转型又恰逢中国的崛起与世界格局的转换，因此，这一转型能否成功不仅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还攸关世界的和平，固亦可称之为“大转型”。

三、中国外交大转型的基本任务

鉴于中国外交这种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为了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推动社会变革与恢复大国地位的“四重唱”以更好地拓展、捍卫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尽早且顺利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在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各方面尽早推进转型任务的完成

。这些转型任务既源于中国外交的历史遗产又源于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

13 根据扎卡里亚的看法，第一次权力转移是开始于15世纪而完成于18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崛起，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奠定了西方国家长盛不衰的政治主导地位；第二次权力转移是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崛起，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稳坐超级大国的宝座。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时代：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一) 外交指导思想：从单一国家利益观到总体国家利益观的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全球内外互联、国内改革攻坚的新形势以及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兴亡的历史教训而试图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等统和起来的战略努力，是排除单一利益考量而重视综合国家利益的战略统筹，是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外交工作的战略安排与顶层设计，必将成为中国外交重大转型新的指导思想。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考中国外交就要求我们坚持总体或综合国家利益观，这一转型意味着从历史上政治利益至上和经济利益至上这种单一的指导思想到综合考虑国家总体宏观长远战略利益的转型。这一转型要求既要放弃改革开放前那种过于强调社会改造的革命理想主义，也要放弃改革开放以来过于强调经济利益的经济现实主义，而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综合平衡，以总体国家利益观作为外交的指导思想。

(二) 外交目标：从失衡到均衡的转型

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境遇，决定了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推动社会变革与恢复大国地位是中国外交的不得不面对同时又不能很好兼顾的四重目标。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国际承认，在对外斗争中巩固国家主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虽然各个时期在外交上体现出的这种选择性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造成的客观后果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比如在安全或政治外交阶段，政治的需要使得经济利益常常被忽视，现代化目标未能得以大力推进；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或经济外交阶段，经济的需要使得一些非经济利益常常被忽视。同时，中国在社会变革方面的滞后与社会外交方面的不足，造成了今日中国外交手段的欠缺与外交社会基础的薄弱。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中国外交只有一个目标导引航向从而导致外交目标失衡的话，复兴外交时期的中国外交必须要同时以多种目标来导引航向，也就是说，中国外交必须同时注重政治、经济与社会外交的均衡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推动社会

变革与恢复大国地位四重目标的均衡统一。

（三）内政与外交关系：从外交依附到外交自主的转型

关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有一条“公理”，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国内与国际政治日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内外联动是其基本特征，“外交中隐藏着内政”、¹⁴内政中贯穿着外交，从而使“双重博弈”、¹⁵“内外联动”成为常态。然而，观察中国 60 多年的外交史，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外交对内政的延续和“隐藏的内政”，甚至还可以发现内政对外交的完全决定或外交对内政的依附，即外交的依附性或“内向性”。所谓外交的依附性或“内向性”，主要是指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是为了国内政治而不全是国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并因此使外交相对失去了自主性，从而使外交与内政关系失衡。正是在外交依附性的长期、深刻影响下，一直以来，作为天然大国的中国由于长期聚焦国内事务，无论是安全外交还是发展外交本质上都是弱国外交或小国外交。此种小国外交表现在外交心态上就是此时的中国外交一直笼罩在深深的“受害者心理”¹⁶阴影里，仍然弥漫在“弱国无外交”的沮丧中；表现在外交行为上就是此时的中国外交主要服务于国内事务的需要；表现在外交后果上就是外交行为与国际贡献度远远低于国际社会甚至自我的期待。从对世界体系的态度和与大国的关系看，中国外交似乎在 1979 年转型最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前致力于复兴目标的中国外交转型不仅是外交目标与外交手段的变化，而且是重拾外交自信、回归大国外交的转型，即解放单纯聚焦国内事务的“小国外交”思维，走出外交从属于内政的传统逻辑实现内政与外交的双

1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1997, p. 48.

15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6 关于中国外交的“受害者心理”及其对外交的影响，参见钱皓：〈龙文化、大国心态、中美关系——对中国“受害者心理”的历史与理论考释〉，《国际观察》，2004 年第 2 期，第 25-30 页；袁南生：〈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同舟共进》，2011 年第 11 期，第 65-68 页。

重博弈与自主均衡，实现大国外交与外交自主性的回归。

（四）外交服务对象：从“国本外交”到“人本外交”的转型

外交为谁服务一直是关系到外交性质的根本问题。虽然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本外交”与“人本外交”并不冲突，但在具体实践中，整体的国家利益与微观的个人利益的关系较为复杂而微妙。虽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人民服务就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宗旨，但限于全能主义国家的现实，“外事无小事”原则指引下的中国外交主要是从国家或政府角度界定国家利益的，“外交为民”更多的体现在宏观抽象整体利益的维护上，而对于微观具体个人的利益较少涉及，甚或彻底被忽视。保罗·埃文斯曾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家间关系中，保护海外公民和法人利益等微观因素正在加大。¹⁷在国家 - 社会逐渐分离的改革背景下，中国外交正在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从国家或政府角度界定国家利益的做法，为普通民众切身利益服务的领事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外交正在重塑“外事无小事”的观念，公共外交不断得到强化。显而易见，中国外交在“外交为民”思想的指引下，正在日益关注对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微观利益的保护，“国本外交”正在向“民本外交”转型并日渐统一。

（五）外交形态：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塑造的转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于国际体系，中国先后经历了革命挑战、犹豫徘徊和理性融入之路，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格局动荡背景下，确立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正是在“韬光养晦”这种内向性大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更多地处于“撞击 - 反应”的被动模式之中。中国在安理会的弃权票记录了中国外交的被动性。这种长期的被动性表现，“虽然可能保护了我们某些直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但却使我们的国际形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也因之丧失了许多表达我们声音的机会……不仅常任理事国中的其他大国习惯于明里暗里甩开中国搞磋商做方案，

17 [加拿大] 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6 期，第 44 页。

连许多原先寄厚望于中国的中小国家也会有失望和不理解。”¹⁸ 沈国放就认为，在国际或者地区发生危机时，中国应该要积极参与参加相关地区的国际会议，不是象征性地出现在会场，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要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设性建议，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要避免华而不实的空话和大话。中国应该积极做好预防性外交，主动提出预防性对策而不是出现了问题后被动地应对。¹⁹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加强了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在国际社会倡导了若干重大战略倡议，正在积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大国外交之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与主动塑造的新取向。尽管如此，但是中国应该塑造哪些议题，何时塑造，以何种强度塑造，中国应该如何承担国际责任、承担哪些国际责任，中国应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外交塑造能力和公信力，这些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六）外交机制：从单一外交到总体外交的转型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信息化加速推进和内政外交一体化日渐彰显的今天，中国外交体制正面临着转型和再造的问题。具体而言，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导致的全球相互依赖与内外联动新情势，已经使当代外交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一，外交主体、客体的多元化与相互竞争态势的强化。其二，外交议程的立体化，高政治议题与低政治议题无所不包。其三，外交的公开化，秘密外交已成历史。其四，外交手段的多样化，领域外交、双多边外交交替并用。正是这四大外交趋势要求中国外交必须走出历史的单一外交体制而实现向总体外交体制的转型。唐家璇在 2004 年就指出外交工作“必须统筹各渠道、各层次、各领域的对外交往”，“做到善谋全局，善谋长远”。²⁰ 但是，鉴于中国外交机制的现实与官僚惰性，实现外交统筹与总体外交并不容易。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下，

18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255 页。

19 沈国放：〈外交转型与大国战略思维〉，《世界知识》，2011 年第 1 期，第 17 页。

20 唐家璇：〈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求是》，2004 年第 23 期，第 5 页。

中国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积极倡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总体外交理念不仅得到强化，而且真正具有了实施总体外交的机制保障。

四、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特色

致力于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中国复兴外交转型之所以令人关注，不仅在于此次转型艰巨的历史与现实任务和对世界和平的深刻影响，而且在于其具有的与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紧密相连的中国特色。认清此次外交大转型的中国观特色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外交行为的特点和性质。

（一）正常外交的回归

纵观前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不同时期的特殊任务，使得前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目标单一，有些失衡。虽然各自为中国外交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各个阶段分别只重视某个侧面，从而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就外交目标来说，正常外交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方面虽然有时会有所偏重但总体上应是并行不悖的，这是正常国家外交下的常态。但对于那些刚刚确立政权、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定型或在国际社会面临特殊生存环境的国家来说，可能在很长时期内外交目标会主要地集中于某一个方面，从而偏离常规。分别为了争取外交承认与发展经济，中国外交在安全外交与发展外交时期确实有点不同于常规外交的通行做法，导致了外交目标的失衡。虽然这种外交选择性的出现源于国内制度的未定型与外交关系的不确定，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实属正常，但相对于那些国内制度定型与外交关系确定的国家来说，这种选择性外交就显得有点“异常”。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2年中共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正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党章。正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定型，已经启动正在大步迈进的复兴外交正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等外交目标的综合平衡，常规外交正在逐步回归。

（二）与内政转型同步

章百家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定型，中国在追寻现代化、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社会变革这四重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所选择，有所偏重，这必然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断调整。²¹ 这既指出了中国外交“内向性”的表现，也道出了中国外交转型的内政根源。正是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内政转型促使中国外交从政治外交转型至经济外交。而在政治与经济外交期间的历次外交调整也与中国内政的变迁紧密相关。例如，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内政导致了中国外交从“一边倒”到“反两霸”的阶段性调整。因此，中国外交从经济外交向复兴外交的转型的内部根源就在于201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定型与确立。也正是中国外交转型的这一特色，“改变自己”成为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²² 基于与内政转型同步的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外交转型也必将随着中国内政转型的完成而淡出“不断剧变”转型轨迹，从而踏上稳定调整的轨道。

（三）义利并举的外交

无政府状态下的外交以国家利益之“利”为根本准绳是现当代外交的基本要义。但对中国外交而言，凡事以利益为准绳却不符合东方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如何维护绝大多数国家的权益、如何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之“义”也应是外交的应有之义。然而，中国外交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义利观”却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安全外交时期，中国外交在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下，“重义轻利”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成为时尚。发展外交时期，中国外交迅速而坚定地确立了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但“利益至上”的务实主义做法凸显了中国外交价值原则的缺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外交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正是基于中国外交在义

21 章百家：〈目标与选择——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第93页。

22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第4-19页。

利观上局部失衡的教训，复兴外交不仅要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也要尽最大努力发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还要基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国家、东方礼仪之邦的现实尽最大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促进世界公平正义。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与历史上历次大国崛起的不同之处，也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外部保障。

（四）与世界和平紧密相关

在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时期，中国虽然也能影响世界，但更多地是受世界的影响。但进入复兴外交时期的中国外交已经完全不同。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动的重大变量，成为国际环境本身的构成部分，为此，此次外交转型能否顺利完成不仅攸关中国能否崛起，而且还攸关世界和平。也正是如此，中国外交如何实现大国崛起方式从暴力崛起到和平崛起的转型就至为重要。

小 结

总之，中国外交在经历了安全与发展外交阶段之后，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和“坐二望一”国际地位的确立，2010年以来正在进入复兴外交时期，外交的社会化与大国化是其两个基本取向。此次中国外交转型不仅具有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外交转型的共同之处，还具有与中国历史遗产、现实国情紧密相关的特定任务和与中国国情紧密相连的中国特色，且又恰逢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世界格局的转换，其转型势在必行，转型任务宏大而艰巨且转型结果攸关世界和平与稳定，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转型。那么，中国外交这一重大转型必然会发生吗？其转型能够顺利完成吗？霍尔蒂曾指出，外交政策要实现重构必须满足三项互为关联的条件：其一，国家内部与外部所发生的转变致使当前的政策模式无法在重大利益的维护上产生效益时；其二，政府了解到当前政策并不适当并且试图有所反应；其三，政府规划出解决问题的新外交政策并且使其产生实效。²³可见，客观情势、主观认知与主体行动是实现外

23 Karl Holsti ed., *Why Nations Realig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p. 2.

交转型的三个必备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动、中国海外利益受损事件的频发、中国周边外交遭遇的巨大挑战、“一带一路”遭遇的舆论挑战和中国国内改革的深入推进均表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挑战要求中国外交进行调整和转型，客观情势条件已经完全满足。近年来关于韬光养晦战略和结盟与否的巨大争论同中国新一届政府奋发有为的外交态势与复兴中国的伟大目标表明政府的转型意愿已经较为强烈，主观认知条件也已完全满足。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加强了对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强化了外交领域的底线思维，并积极谋划了诸多外交倡议，中国外交转型的主观条件也已具备。但中国外交大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遭遇的严峻挑战表明，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对中国外交大转型进行了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但新外交规划的成效尚未得到检验，转型的广度、深度与效度尚不明朗。可见，当前国际安全的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表明，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如何进行、走向何方、效果如何并不完全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政府与国内外社会的良性互动能否实现，但我们不能由此被动等待，而必须主动谋划。因为，“在没有任何重大体系力量的时候，政策制定者能够成为变迁的施动者”。²⁴然而，鉴于中国历史与体制的特殊性，中国能否通过与国内外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外交大转型可能是中国外交大转型更大的挑战与机遇。因此，在中国外交经历重大转型之际及时探讨中国外交大转型的特定任务与中国特色就极为必要。当然，这种探讨尚是一家之言，但如果能够抛砖引玉，这必将为中国外交大转型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引和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1. 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2. 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时代：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24 Charles F.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1, 1990, p.20.

3. 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 李志永：〈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
5. 沈国放：〈外交转型与大国战略思维〉，《世界知识》，2011年第1期。
6. 唐家璇：〈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求是》，2004年第23期。
7. 百家：〈目标与选择——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8.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9.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0. 章百家：〈目标与选择——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11. Evans, Peter B.,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2. Hermann, Charles F.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1, 1990.
13. Holsti, Karl, ed. *Why Nations Realig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14.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1997.
15. Rosati, Jerel. Cycles i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the Polit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Jerel Rosati, Joe D. Hagan and Martin W. Sampson eds.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16. Rosati, Jerel, Martin W. Sampson and Joe D. Hagan. The Study of Change of Foreign Policy, in Jerel Rosati, Joe D. Hagan and Martin W. Sampson eds.,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